

日常生活中的反共知識建構

—以《廣播雜誌》為中心（1952-1956）

林果顯

摘要

本文目的在於探討兩個提問：縈繞於一九五〇年代一般人民的生活裡，究竟從收音機中聽到些什麼？國民黨政府在壟斷廣播媒體的優勢下，用那些形式將政策理念下達於基層？本文從準戰時體制的架構，首先檢視日治時期總動員體制與中華民國抗戰、動員戡亂體制下的臺灣廣播媒體環境，梳理五〇年代收音機市場、收聽習慣與廣播媒體在宣傳體系中的定位。其次，在聲音資料難以保存尋獲的情況下，別於既有研究限於外在的政策討論，而由保留大量節目資訊的《廣播雜誌》出發，直接深入考察當時的廣播節目內容。本文指出，當時的廣播表現形式，不論是廣播劇的發展、聯播節目的進行，或是各種類型的節目，都從硬性宣傳轉向生活情境的建構，顯示中華民國政府已逐漸擺脫 1949 年「風雨飄搖」的危機，開始學習向民眾傳達更為柔軟的形象，在黨政部門篩選和壟斷資訊的環境中，建立一個鼓吹戰備卻又容易親近的廣播世界。最後，宣傳手法的翻新，意味著黨政部門有能力更細膩地介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五〇年代的摸索嘗試，成為六〇年代更加細密控制的基礎。

關鍵詞：廣播史、廣播雜誌、收音機、反共、準戰時體制

Constructing Anti-communist Ideology in Daily Life : A Study of the Radio Broadcasting Magazine, 1952-1956

Guo-Sian Lin *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two concerns: What did the people in Taiwan learn from the radio broadcasting in the 1950s? What forms were used by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to disseminate its policies to the public by way of controlled radio broadcasting? In this paper I begin my study, in the view of quasi war-time system, on the broadcasting environment and the condition of radio broadcasting in three wartime systems: the general mobilization in Japanese colonial era,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aiwan under the National Mobilization for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Rebellion. Then, by taking a perspectiv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radio broadcasting policy, I analyze the contents of broadcasts introduced in the Radio Broadcasting Magazine. I would argue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radio programs changed from compelling propaganda to soft presentation of daily life. In other words, the Kuomintang gradually got out of the crisis in 1949 and learned how to construct friendly media to disseminate anticommunist ideology through selected information. The change of broadcasts shows that the Kuomintang was able to penetrate the daily life of Taiwan people. The experiences in the 1950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strict control in the 1960s.

Keywords :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Radio Broadcasting Magazine, radio, anticommunism, quasi war-time system.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日常生活中的反共知識建構

—以《廣播雜誌》為中心（1952-1956）*

林果顯**

一、前言

一九五〇年代是中華民國政府意圖穩固在臺根基、逐步滲入社會各層面的關鍵時期，讓原本從大陸一路敗退、喪失國土與國民 90% 以上的黨政當局，對內能夠進行黨務改造與土地改革，對外能夠獲得美國支持，並利用冷戰格局維持中國代表權，伺機進行反攻戰事。臺灣人民在剛接受過「八紘一宇」的皇民化教育後，馬上又須服膺「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使得戰後的臺灣在某一層面上又再度沉浸在另一場戰爭裡。五〇年代前半葉，總動員運動、克難運動與建艦復仇運動等動員宣傳不斷推行，顯見政府致力於將人民的生活戰鬥化，以保持發動戰爭的可能性。¹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7 年 1 月 5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 年 3 月 30 日。

本文曾發表於國史館舉辦：「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中華民國史第八屆專題討論會」（2005 年 11 月 25 日），承蒙評論人林淇養教授惠賜寶貴意見，特致謝忱。另外，兩位匿名評審的懇切建議，一併致謝。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¹ 據吳乃德統計，五〇至六〇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所進行的動員運動有：克難運動（1953）、建艦復仇運動（1954）、支援武漢學生反共運動（1956）、保衛金馬運動（1958）、支援西藏同胞反共運動（1959）、青年自強運動（1962）、青年自覺運動（1963）、毋忘在莒運動（1964）。見 Nai-teh Wu（吳乃德），*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Ph. D Thesis, Dp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p. 141.

在黨政當局的動員宣傳體系裡，廣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相對於報紙、雜誌與海報，廣播能將訊息迅速、無形而正確地傳達到各地，同時語言這項媒介又較文字親近活潑，因此對於深受共產黨宣傳活動之苦的國民黨而言，掌握廣播媒體並善加利用，自是鼓吹臺灣人民效忠政府、敵視中國共產黨，並進行反攻大業的一大利器。另一方面，臺灣由於經過日本的殖民與現代化，對於廣播這項現代產物並不陌生，利用收音機瞭解標準時間、²獲取市場與政壇最新訊息、聆聽流行歌曲，在 1938 年每千人擁有收音機為 8 人，於亞洲地區排名第四，到了 1943 年平均每十戶臺灣家庭便有一架收音機。³換言之，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以前，廣播已是臺灣一般人民娛樂與訊息來源的新興主流媒體，是建立生活知識的重要基礎。黨政當局透過廣播電臺的接收與整併，進行執照、機器與內容的管制，目的使一般人民能在潛移默化中響應國策，支持政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臺灣這個小島上，憑藉著日本人留下的遺產，這是國民黨第一次有機會建立一個如此「乾淨」的環境，將其意志深入於每一角落。

因而在更強勢的媒體（電視）出現之前，循著日治時期的習慣，以及政府刻意地推展下，許多民眾透過收音機洩而出的旋律與廣播劇，慰藉生活的寂聊、清淡與辛苦。在當局將收聽對象設定為不需要識字的群眾時，⁴節目內容勢必以更為簡潔、輕鬆、娛樂性的方式呈現；而國民黨政府賦予

² 呂紹理：《水螺響起》（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 年），頁 167。

³ 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2002 年 5 月），頁 309-310；何義麟：〈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跨越國境線—近代臺灣去殖民化之歷程》（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 年），頁 92。值得注意的是，這其中日本人與臺灣人所擁有收音機的比例懸殊甚大，廣播資源的分配設定對象有所輕重，不過，諸如流行歌曲藉由收音機擄獲人心，在促進臺灣「大眾文化」的形成上，則有不可抹滅的角色。李承機：〈ラジオ放送 植民地台湾の大眾文化〉，收入：貴志俊彦、川島真、孫安石：《戦争・ラジオ・記憶》（東京：勉誠出版，2006 年），頁 147-153。

⁴ 黨政宣傳體系的立場是，印刷媒介的對象必須通曉文字，因此教育水準較高。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編印）：《宣傳工作手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

廣播的任務，包括負擔「對匪宣傳」、心理作戰、防止「匪波」蓋臺，對內宣導政令，並提供教育與娛樂。⁵也就是說，在輕鬆愉快、無形無味的空氣中，其實瀰漫著嚴格篩選的訊息與沉重的使命。民眾也在此影響下，有意無意地建立起符合官方意識型態的「知識倉庫」，⁶整合彼此間的歧異，塑造對於自身以及世界的認識，讓收聽的臺灣人民自然地產生「自由中國」的共識。

因此，本文想問的是：透過收音機，究竟當時一般人民聽到了些什麼？在運用此項新興媒體的過程中，國民黨政府發展出了什麼樣的統治型態？是否有什麼變化？為了解決上述疑問，勢必考察當時的節目內容。然而，由於聲音保存的意願與技術限制、電臺經營的興衰，加上主管機關的遞嬗，⁷使得追尋當時的聲音內容成為一項困難的任務。先行研究者亦受限於此種資料限制，多半從法令與政策變遷切入，少有直接觸及節目內容者。⁸為了

四組，1969年），頁101。

⁵ 以聯播節目為例，便是由黨部和政府部門聯合決定播出時間與內容。見張瑞玉：〈聯播節目的創辦及沿革〉，《廣播年刊》（臺北：廣播年刊編輯委員會，1955年），頁49-54。

⁶ 該概念係由 A. Schutz 與 T. Luckmann 所提出，指透過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經驗，建立屬於個人獨特的知識體系，藉以形塑思考、解釋和參與行動的依據。參見 P. L. Berger & T.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6), pp. 47-128.

⁷ 根據 1959 年「廣播無線電臺設置及管理規則」與「廣播無線電臺節目規範」，廣播電臺應準備節目日記與工作日記，保存兩年以備查考，並送副本由主管機關收存。因此，在不確定主管機關是否完整移交與妥善保存的情況下，廣播電臺的這兩份日記是否仍完整地存在，難以樂觀。見「廣播無線電臺設置及管理規則」第三十九條規定；「廣播無線電臺設置及管理規則」第三十九條規定。見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編註）：《新聞自由（1945-1960）》（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450、458。（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

⁸ 目前國內對於戰後臺灣廣播媒體的研究，多集中於八〇年代之後的變化，對於五〇年代較少關注。涉及此斷限的多為時人的記述，而體系性研究則從大架構著手，無力深入節目內容。例如溫世光：《中國廣播電視發展史》（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陳世慶：〈中廣事業在臺之發展〉，《臺灣文獻》，21：4（1970年12月），頁72-103；陳世慶：〈民營廣播建設在臺灣〉，《臺灣文獻》，22：2（1971年6月），頁89-103；陳世慶：

突破此一限制，本文將研究對象設定為《廣播雜誌》雙週刊（前身為《廣播周刊》），該刊保留了當時廣播節目內容型態的片鱗隻爪，透過文字進行節目預告、介紹播音員、刊登廣播劇本，並且夾帶各種活動訊息，在沒有直接史料的情況下，是目前最接近五〇年代廣播內容的文獻。另外，透過「紙上廣播」的形式，《廣播雜誌》兼有廣播的內容與文字宣傳的特色，藉由期刊文本分析的方式，將可得到更為豐碩的宣傳圖像，同時具有政策落實與重建生活實況的雙重意義。

二、準戰時體制下的廣播定位

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廣播媒體環境，承續了三套戰爭時期的法規制度，分別是日本殖民統治後期的總力戰體制、中國的對日抗戰體制，以及針對中共而進行的動員戡亂體制，也就是說，利用日本在戰爭期間所建立的廣播媒體環境，配合對日抗戰與戡亂時期所頒布的宣傳相關法規，在反攻大陸的需求下，中華民國政府得以運用被視為強大宣傳工具的廣播事業，進行宣導與教化。然而，即使體制上延續著戰爭時期的設計，但實際上卻一直無法進行大規模的戰事，這種準戰時體制的狀態，⁹在無法放棄反攻大陸此一統治正當性的情況下，當局更加需要持續宣傳反共抗俄信念，鞏固人民擁護政府的信心。¹⁰政府如何在日治時期的遺產上增加收音機數

〈軍公廣播電臺在臺之發展〉，《臺灣文獻》，22：1（1971年3月），頁155-181。另外，日本學者川島真則從國史館所藏外交檔案中，梳理戰後臺灣海外廣播的政策與作為，受限於資料性質，亦無涉及節目實質內容。川島真：〈戰後台湾の對外ラジオ放送政策〉，《戦争・ラジオ・記憶》，頁198-218。

⁹ 有關準戰時體制的相關討論，參見林果顯：〈戰後臺灣統治體制的再思考—威權體制的理論與適用〉，《現代學術研究》，專刊13（2004年12月），頁76-82。

¹⁰ 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將三種戰時體制延續與融合，本是一項極大的課題，即使聚焦於廣播媒體，亦難以在此文中完整鋪陳，日後當進一步開展。此外，由於本文著重於當時廣播媒體的內容與呈現方式，相關法規與制度不予特別討論。

量、建構戰時廣播環境，以及當時傳播理論對廣播的定位，直接影響到廣播節目的內容與呈現方式。

（一）日治時期遺產與戰後的收音機數量

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時，所承接的是個因戰爭而大幅成長的廣播媒體環境。臺灣首度的廣播出現在 1925 年 6 月，當時在始政三十週年博覽會的會場上播放十日，是臺灣廣播放送的開端。不過僅僅屬於實驗性質，一直要到 1928 年臺北放送局設置，1931 年臺灣放送協會成立，繼而臺北、臺南、臺中放送局開始營運，廣播才算進入正常運作。¹¹然而臺灣的廣播事業是因為戰爭才進一步地迅速發展，特別是盧溝橋事變與太平洋戰爭爆發，臺灣在日本對中國作戰以及大東亞共榮圈中占有樞紐的戰略地位，使得廣播放送肩負國民塑造、南方情勢介紹、文化養成與對敵宣傳等任務，也使得臺灣島內的收音機數量大幅提昇，至 1945 年戰爭結束前，全臺約有 100,000 架左右的收音機。¹²

研究指出，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 年的盧溝橋事變與 1941 年太平洋戰爭開戰，使得日本國內的收音機普及率大幅上升，這一來是因為收音機成為總動員體制下不可或缺的工具，二來則是日本本土人民對海外戰事即時消息的需求。從 1937 年到 1941 年，收音機的家戶普及率上升一倍，半數家庭擁有附擴音器的收音機，大多數的家庭在此時養成了一家人共同收聽廣播的習慣；¹³同樣的，臺灣亦是在 1937 年與 1941 年兩次戰爭爆後，收音機的收聽戶大量增加，而且由於日人收聽戶已大致飽和，新增的收聽戶大多為臺灣人家庭。換言之，藉由戰爭契機，收音機的普及與收聽習慣

¹¹ 日本放送協會（編）：《20 世紀放送史》，上（東京：日本放送協會，2001 年），頁 68-69。

¹² 日本放送協會（編）：〈台灣の放送事業〉，《ラジオ年鑑》，昭和十七年（東京：日本放送協會，1942 年），頁 344-346。

¹³ 山口誠：〈ラジオ放送の出現と一九二〇年代の社会〉，有山輝雄、竹山昭子（編）：《メディア史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2004 年），頁 172-173。

的養成已在臺灣生根，配合著全島性廣播網的建立完成，戰後國民政府面對的是個已有一定基礎的媒體環境。¹⁴

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進行接收事宜，中央指派國際臺傳音科專員林忠，為臺灣區廣播電臺接收專員，與臺灣放送協會接洽，於 1945 年 11 月起接收臺灣、臺南、臺中、嘉義、花蓮臺，改稱臺灣廣播電臺，並新設臺東臺與高雄臺，¹⁵隸屬於國民黨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1946 年，為了因應行憲，將該處改組為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廣），並與行政院簽約，受委託宣揚政令與播送教育節目，接受政府補助。¹⁶1949 年，政府撤退來臺，中廣在臺北舉行首次股東會議，公司組織正式完備，臺灣各電臺納入該公司管轄，同時通過「現階段業務方針」，闡明「一切廣播業務以反共抗俄為主要目的」；¹⁷另一方面，政府透過「廣播無線電臺設置規則」、「電信監察實施辦法」、「臺灣省戒嚴期間無線電臺管制辦法」、「廣播無線電臺節目規範」等法規，構成了因應可能戰事的媒體環境。¹⁸此時，臺灣的廣播電臺除了中廣之外，主要還有民營的商業電臺，以及另成體系的軍中電臺。

與日治時期相同，一九五〇年代在反共抗俄的國策下，拓展收音機數量亦成為重要工作。根據估計，戰後初期臺灣每年進口的收音機平均約近 5,000 架，加上 1949 年前後許多人由大陸攜帶來臺，一九五〇年代一開始

¹⁴ 何義麟：〈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頁 106-110。

¹⁵ 溫世光：《中國廣播電視發展史》，頁 80；川島真：〈戰後台湾の對外ラジオ放送政策〉，頁 200。

¹⁶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編）：《中廣五十年》（臺北：空中雜誌社，1978 年），頁 332。

¹⁷ 吳道一：《中廣四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68 年），頁 254-255。

¹⁸ 有關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對臺灣廣播媒體的新聞控制，參見薛化元、楊秀菁：〈戰後臺灣新聞自由的歷史考察（1945-1988）〉（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1-2411-H-004-027，2003 年），頁 26-28。

的收音機數量，當不致少於日治末期。¹⁹然而，1952年收音機登記架數僅有50,000架出頭，廣播界深感「播音員在麥克風前喋喋不休的播了出去，而有收音機的人家那麼少，究竟有多少人在聽呢？」²⁰因此，政府一方面透過憲警與電信人員的多次檢查，要求未登錄者補行登記，另一方面加強供應收音機，例如中國廣播公司就曾自國外購買大批收音機接受民眾配購，²¹之後亦販售「中廣牌收音機」，每月供應300架。²²

從收音機登錄的數字來看，隨著隱匿登錄的情形被檢查出來，加上廣播事業的擴展，到了1962年，臺灣的收音機的登錄架數已超過100萬架。從圖一可以發現，一九五〇年代的收音機，以遠超過日治時期的速率和數量成長；²³從表1更可清楚看到，收音機在戰後短短十年內，由平均20戶1架成長到2戶1架，每千人就擁有87架，與每千人擁有的報紙份數不相上下，甚至在電視開播的衝擊下，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前期，臺灣人民擁有收音機的數目仍超過報紙。若再考量到廣播不必識字即可接收訊息、一部

¹⁹ 溫世光：《中國廣播電視發展史》，頁290-291。

¹⁹ 日本放送協會（編）：《20世紀放送史》，上，頁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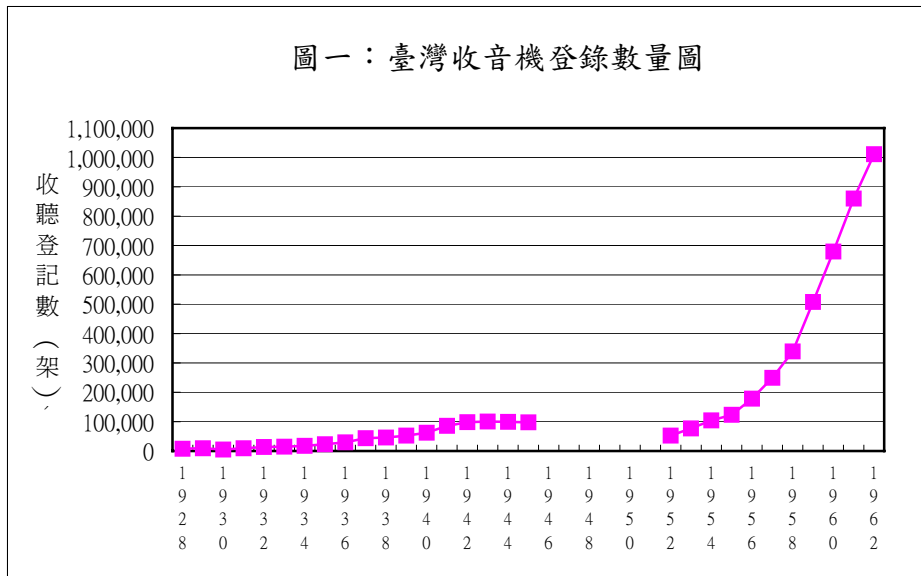
²⁰ 況味初：〈董顯光先生的建議〉，《廣播周刊》，1:4（1952年4月19日），頁1。

²¹ 見〈中國廣播公司配售收音機〉，《廣播周刊》，1:12（1952年6月14日），頁6。

²² 中廣對於因器材取得困難而導致每月僅能提供三百架，亦感不足，在回應聽眾時表示，若器材供應充份，才能普及銷售。見〈聽眾信箱〉，《廣播雜誌》，5:8（1953年10月31日），頁32；〈中廣公司業務所介紹〉，《廣播雜誌》，100（1955年6月1日），頁16-19。

²³ 空白的部分表示目前尚未尋獲確實數據。另外，日治時期的數字是聽取者的登記數，戰後則是以收音機為登錄單位，兩者雖不相同，但日治時期原則上一戶人家有收音機時，推一人登錄，因此聽取者登錄數可視為收音機的登錄數量。戰前資料取自：日本放送協會（編）：〈台灣の放送事業〉，《ラジオ年鑑》，昭和十八年（東京：日本放送協會，1943年），頁269；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頁310。戰後資料來源：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卷五—教育志文化事業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8年），頁427；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卷五—教育志·文化事業篇第二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年），頁225。1956年之後，以交通部統計資料為準。見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中華民國六十五年統計提要》（臺北：行政院主計處，1977年），頁402。

收音機由一家人共享的收聽習慣，以及兼具即時性與同時性的特質，廣播確實是一九五〇年代政府所極力推展，亦為民眾訊息接收管道最強勢的媒體之一。²⁴



²⁴ 程宗明認為，1961年臺灣的廣播電臺密度居世界之冠，但國民擁有收音機數量卻居末位，顯示在廣播電波戰的軍事考量下，設立大量電臺以構築防禦陣線，卻使人民收聽廣播的社會意義不彰，加上政府的補貼政策和美國資本的介入，使得收音機成長只維持中度，是一種「抑制需求面與管制生產面」的收音機產業。筆者認為，程氏點出了廣播對於防堵「匪波」的消極面與制度面，本文則企圖關注形塑反共知識的積極面與實際的收聽內容和反應，同時，若將觀察時限拉長，不論是與日治時期比較，或是1962年臺視成立後的變化，皆可看出五〇年代收音機竄起成為主流媒體之勢，以及受到電視影響後明顯成長受挫的表現。見程宗明：〈臺灣戰後廣播工作的控制與依附研究（1947-1961）：抑制需求面與管制生產面的收音機產業〉，《傳播論文選集1997》（臺北：中華傳播學會，1997年），頁319-370。

表 1：臺灣收音機與報紙影響力統計表²⁵

年度	臺閩地區戶數	臺閩地區人口	收音機架數	戶/架	千人/架	報紙印量	千人/份
1952		8,169,183	52,457		6.42		
1953	1,561,686	8,479,971	76,824	20.33	9.06		
1954	1,577,413	8,792,997	104,307	15.12	11.86		
1955	1,638,968	9,122,525	123,020	13.32	13.49		
1956	1,705,063	9,435,615	178,580	9.55	18.93		
1957	1,755,730	9,737,115	249,081	7.05	25.58		
1958	1,812,566	10,080,045	339,109	5.35	33.64		
1959	1,812,045	10,472,355	507,505	3.57	48.46		
1960	1,958,457	10,837,762	679,297	2.88	62.68	720,000	66.43
1961	2,011,469	11,196,667	860,260	2.34	76.83		
1962	2,069,523	11,561,073	1,011,197	2.05	87.47		
1971	2,794,149	15,367,774	1,464,423	1.91	95.29	1,370,000	89.15

（二） 宣傳理論中的廣播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不論是戰前、戰時還是戰後，廣播事業都深受政府倚重，這與當時人們對於宣傳功效的認識有密切關係。比起活字印刷的紙本媒體，（無線電）廣播具有同時性、低成本與遠距離的強大優勢，在剛出現

²⁵ 本表與圖一相同，於統計上主要呈現至 1962 年，這是因為該年臺視開播後，收音機再也無法如五〇年代般快速成長，且該年亦為突破一百萬架的指標性時刻，可視為收音機發展達高峰與開始衰微的關鍵轉折；1971 年的統計則是表現收音機較報紙普及的情況。戶口資料：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中華民國六十五年統計提要》，頁 30；報紙印量：楊肅民：《限證政策下我國報業問題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年），頁 26。此外，報紙發行量或印量在商業機密考量下，一直未能有歷年明確數據，數據取自同業公會年鑑，有出入時取較多的數字。見曾虛白：〈中國報業發展經緯〉，《中華民國新聞年鑑》，民國 50 年（臺北：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1961 年），頁 17；漆敬堯：〈十年來報業發展〉，《中華民國新聞年鑑》，民國 70 年（臺北：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1981 年），頁 49。

的 20 世紀初，被期待為達成普遍性傳播的優質媒體。第一次世界大戰透過大眾傳播工具，以鼓動人心和對敵宣傳的「宣傳戰」，成為現代戰爭的重要特徵，廣播的上述優點因而容易轉化為戰爭機器的一環。²⁶

一次大戰之後學界對於大眾傳播的研究，亦聚焦於宣傳的強勢力量，而發展出「子彈理論」(bullet theory)，亦即「人們極容易受到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也就是說，只要大眾傳播內容能射中目標，它們通常就能達到預期的目標，而且效果相當直接、強勁」。²⁷當時的重要著作《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術》中指出：²⁸

一種更新、更細微的工具必須融合數千甚至數百萬的人類，成為結合大眾恨意、意志和希望的合併體。一種新的火焰必使人們對異議失去興趣，並且鍛鍊起好戰好鬥的熱情，這組影響社會團結的新錘頭和鐵砧的名字就是宣傳。

換言之，當時的宣傳理論假設人類是可以統一操控的，他們表現出的一致程度多寡，乃是取決於何種刺激而定。²⁹

也就是基於只要將資訊傳達出去，就能對接收者造成影響的想法，廣播這項新興媒體才備受重視。最能理解廣播的宣傳特性並大力發展的是納粹德國，大量製造廉價、單一頻道的收音機，進而強迫公共場所安裝廣播

²⁶ 佐藤卓巳：《現代メディア史》（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頁117-122、141-146。

²⁷ 或稱為「皮下注射針理論」(jypodermic-needle theory)，或「刺激反應理論」(stimulus-response theory)。見翁秀琪：《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頁47-48。當然，傳播理論自1920年代以來已多所發展，此處引用「子彈理論」只為說明當時，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宣傳所抱有的態度。此點感謝評論人林淇養教授的提醒。

²⁸ H. Lasswell,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NY: Knopf, 1927), pp. 220-221. 轉引自 Garth S. Jowett, Victoria O'Donnel (著)：《宣傳與說服》（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頁164。

²⁹ Lowery & DeFeru,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Y: Longman, 1995), p. 400. 轉引自 Garth S. Jowett, Victoria O'Donnel (著)，《宣傳與說服》，頁164。

擴音器，並向內外從事廣播宣傳。³⁰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國運用廣播從事宣傳與反宣傳的技術不斷增進，雖然之後學界的研究，開始逐漸發現宣傳的有限性，並轉向傳播過程的細緻研究，但是這些戰時的廣播宣傳技巧，以及廣播即時性和遠距離等特性，在冷戰體系當中依然扮演著重要角色。例如，一九五〇年代，美國配合圍堵政策，在所謂「鐵幕」的周邊建造「美國之音」、「自由歐洲之音」等廣播電臺，就是將廣播視為突破地理限制、從內部造成共產世界崩潰的重要工具。³¹

由此可知，不論是從當時的學界研究汲取對廣播的認識，或是面臨戰爭情勢時學習美國的作法，廣播成為當局者無法忽視的重要統治與戰鬥工具，對內利用廣播宣達政令以擁護政府，對外則以廣播煽動大陸內部反抗中共。³²在警備總部的文件中，亦表明廣播電台「值此反攻前夕，更負有配合軍事需要，執行心戰，安定民心，鼓舞士氣之任務」。³³配合著相關法制的建立、廣播電臺與收音機的普及，廣播成為報紙之外，國民黨政府向臺灣人民宣揚其反共政策的主要工具，而其實際內容為何？則有賴以下對於《廣播雜誌》的分析討論。

三、《廣播雜誌》所呈現的廣播世界

³⁰ Garth S. Jowett, Victoria O'Donnell (著)，《宣傳與說服》，頁 241。

³¹ 鈕先鍾(摘譯)：〈透過鐵幕的秘密新武器〉，《廣播周刊》，1：2(1952.4.5)，頁 4-5；張長智：《美國國際宣傳》，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68 年。(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³² 國民黨政府對於失去大陸的檢討中，有一個重要理由是宣傳上的失敗，因此戰後於臺灣大力建構宣傳體系，並對廣播、文藝人士戒慎恐懼。見崔小萍：《天鵝悲歌：資深廣播人崔小萍的天堂與煉獄》(臺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頁 271。

³³ 此外，到了六〇年代定期以演習形式，針對臺灣的所有廣播電台實施安全調查，特別著重電台設施的安全防護，以及節目內容和人員的管控情形。見「全省軍公民營廣播電台安全調查檢討報告」，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廣播安全會報，1966 年 3 月，國史館檔案，檔號 030.07/3780.01-01。

就中華民國政府而言，《廣播雜誌》並非首創的廣播刊物。1934年《廣播週報》創刊，共出版超過300期，每期登載中國主要電臺詳細節目表，使讀者得以按表收聽，同時刊有名人演講稿、廣播常識與流行音樂樂譜等，銷量最高時達到22,000餘份。該雜誌雖因抗戰停刊，但戰後亦設法復刊，可見得主管當局相當重視文字和聲音結合的作法。³⁴1952年，臺灣廣播事業逐漸發展之際，被認為需要一份定期刊物，而此意見也被統合主管廣播業務的教育部廣播事業輔導委員會所接受，此即《廣播雜誌》前身《廣播周刊》創辦的原委。³⁵大陸時期辦《廣播週報》的成功經驗，或許是在臺灣推動《廣播雜誌》印行的動力之一。

《廣播周刊》創辦於1952年廣播節(3月26日)，由廣播雜誌社出版，每週1期。經費來源由廣播事業輔導委員會在收聽費之內每月撥付經費8,000元支持。雜誌社社長為邱楠，匡文炳擔任總編輯，但一年後因為經費來源問題而停刊，同年7月1日復刊，改為雙週刊，名稱也改為《廣播雜誌》，由匡文炳擔任社長，蔣頤為總編輯，謝劍萍為總經理，同時成立出版委員會，由各電臺負責人擔任出版委員。³⁶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來看，一直到1967年仍有持續刊行。³⁷

該份雜誌標榜「看過以後再聽，聽過以後再看，不看不便於聽，不聽

³⁴ 該刊由國民政府中央廣播無線電台管理處主導，於1934年9月創刊，至150期(1937年8月)因中日戰爭停刊，151-196期(1939年1月至1941年4月)於重慶復刊，戰後仍持續有二年多(197-312期，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見吳道一：〈中國廣播事業簡史〉，《廣播年刊》，頁23、30、42；貴志俊彥：〈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電波戦争」の諸相〉，《戦争・ラジオ・記憶》，頁39、56。

³⁵ 王鈞：〈廣播界的刊物—廣播雜誌〉，《廣播年刊》，頁168。

³⁶ 王鈞：〈廣播界的刊物—廣播雜誌〉，《廣播年刊》，頁168。

³⁷ 目前國內有關該份雜誌的收藏，以政治大學和臺灣師範大學最為豐富。政治大學圖書館藏，由1卷2期(1952.04.05)開始至10卷12期(125期，1956.06.20)，中間除了第2卷全部闕漏外，其餘大致完整。臺灣師範大學則是收有《廣播周刊》第1卷第1期至第13期，《廣播雜誌》第111至第130期(1955-1956)、第234至第268期(1964-1967)。

也可以看」。³⁸以內容形式而言，週刊時期每份 16 頁，開頭以類似社論的方式，由編者或請專人撰寫有關廣播的文章；其他重要的內容，包括電臺、節目與播音員的簡介與花絮、節目預告表、即將播出的政令與翻譯稿件、廣播劇的稿件、收音機與廣播常識與新知、笑話與世界珍聞等等，另外，還有聽眾園地與讀者信箱的部分，前者讓聽眾得以投稿刊登有關廣播的文字，後者則直接回應讀者的疑問與需求。改為雙週刊後，內頁數增加至 36 頁以上，除了上述內容再行擴增外，新增許多美國電視與電影制度和名人介紹，相片張數也明顯增加，除了播音員簡介原本就附有相片外，大量引介美國影視女明星。此外，週刊與雙週刊不定期登有電臺啟事、漫畫、反共歌曲曲譜、空中教學講義，定期附上臺灣當季所有廣播電臺節目表。

為了探求一九五〇年代臺灣人民日常生活所收聽的廣播內容，並突破聲音資料難以留存的障礙，本文以《廣播雜誌》作為窺探的主要管道。然而，作為一份文字性的刊物，自然與以聲音為媒介的廣播有所差異，例如留存於雜誌中的是比較容易用文字記錄的節目類型；此外，為了填補文章版面所編寫的笑話與小短文，以及作為類似專論或社論的文章，都是廣播中所缺乏的。但是，此份刊物目的在於輔佐收聽，本身就意欲構成廣播的其中一個環節，只要在分析時謹記資料性質的特殊性，或許能考察當時日常生活反共知識的建構過程。

（一） 廣播劇：何謂日常

在廣播節目當中，廣播劇（或稱廣播話劇、聲劇）最兼具娛樂與宣傳的效果，特別是在電視尚未開播、電影發展有限的五〇年代，廣播劇豐富的聲音變化與優美的文學氣息，成為一般人民重要的娛樂來源。而當局者也體認到此一媒介的重要性，亦從初期的簡易形式，發展為投入資源培養

³⁸ 《廣播周刊》，1:2（1952.04.05），封面裡。

廣播劇作家、組織專業性劇團，並安排於每日的重要時段播出。³⁹當時每日晚間八點至八點半為各電臺聯播節目，⁴⁰每天呈現不同內容，週日與平日一天安排廣播劇演出，特別是週日的大型廣播劇備受歡迎。⁴¹可以說，廣播劇體現了當局介入日常生活的意志與形式，是探討「潛移默化」的良好切入點。

即使在《廣播周刊》每期僅有 16 頁的情況下，幾乎每期都刊有廣播劇的稿本，其中比較重要且長期刊登的劇本是聯播節目中的「民間夜話」，以及中廣臺灣台緊接聯播節目後的「夫婦之間」。「民間夜話」透過華父、華華（女性）與張志中三位人物，以對話的方式，傳達當時期的政令。例如在〈談跳舞〉中，針對當時政府部門正在討論的舞禁議題，由華華表達反

³⁹ 1954 年中廣首創特約作者制度，以契約保障劇本的寫作，由作者擬訂大綱，經中廣審訂確定後再行寫作，中廣只能通知修改而不可退回。主事者為中廣節目部主任邱楠，朱白水、劉非烈、趙之誠、劉枋定期輪流供稿。見呂後塵：〈廣播劇加入了戲劇的聯合國——記中國廣播公司廣播劇團兼團長邱楠先生一席談〉，《廣播雜誌》，116（1956 年 2 月 5 日），頁 6-8；李國聲：〈首屆廣播獎得獎人介紹〉，《廣播雜誌》，106（1955 年 9 月 5 日），頁 5-6。有關廣播劇的相關討論以及當時的廣播劇聯播節目表，參見陳沅：〈談廣播劇〉，《廣播年刊》，頁 90-95。〈自由中國廣播電臺聯合節目表〉，《廣播雜誌》，5:6（1953 年 10 月 3 日），頁 20-31。

⁴⁰ 從日治時期開始，廣播節目就以晚間時段為主，而在歷次廣播調查中，晚間的收聽比例亦一直維持最高，這或許是因為大部分聽眾是在家利用閒暇，與家人一同收聽所致。不過值得思考的是，戰後的廣播調查大多集中於都市與北部地區，無法看出城鄉生活型態在時間安排上的差異與影響。將主力時段置於晚間，是否是出於城市的作息安排，仍有待進一步研究。見何家駒：《我國電視興起對廣播影響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1 年），頁 52-67。

⁴¹ 朱白水先生曾追述當時週日晚間廣播劇的收聽盛況。見朱白水：〈三十年來的廣播劇〉，《廣播實務》（臺北：中華民國廣播電視事業協會，1982 年），頁 137-138。中廣週日的廣播劇自是當時的主流，可惜在《廣播雜誌》上未能刊載，不過當時受歡迎的程度，從中廣發行廣播劇唱片、出版劇本上可見一斑。其中崔小萍、劉非烈等人相當活躍，崔小萍並在其回憶錄中，節錄許多劇本片段，有待日後進一步研究。見崔小萍：《天鵝悲歌：資深廣播人崔小萍的天堂與煉獄》，頁 32-33、46-133；何光國：《廣播節目製作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60 年），第七章。（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對開放跳舞的立場，張志中則持贊成意見，反覆申論，最後由華父作裁判。其餘包括〈敬軍〉、〈母親與護士〉、〈青年到軍中去〉、〈動員〉、〈公共秩序〉、〈從黑暗回到光明〉，不論是題目或是內容，均直接表現出當局者的期望。

《廣播雜誌》所收錄的「民間夜話」劇本集中於 1952-1953 年，就內容而言，反映出當時期宣傳的重要任務：立即性的戰時準備。不論是生活的哪一層面，即使是娛樂、生涯選擇、日常行事等等，皆以因應即將發生的戰爭來作為訴求。以〈談跳舞〉為例，藉由華華的言論，表達出對社會上逐漸安於承平的焦慮感：⁴²

在平時，跳舞已經和國民經濟脫節，變成一種洋化的奢侈品，
在戰時，這更不合需要，即使跳舞確實有益，我們也來不及去試
驗他，因為我們正跳舞的時候，敵人正在練兵！

正因為宣傳的重點在於提醒人民備戰，因此護士「救傷兵，間接的就是救護國家民族」；⁴³軍人是最優秀的人民、戰鬥是最優美的藝術；⁴⁴富有的人出錢、財力不足的人節約，知識分子不應該只伸手向政府要錢；⁴⁵甚至公共汽車秩序混亂，都要以戰時最需守秩序向人民宣傳。⁴⁶總而言之，社會中的每種職業、每個階層，均應以戰時準備作為最高行事準則。

嚴格來說，「民間夜話」談不上正式的廣播劇，因為不論在音樂的運用，或是戲劇技巧的運用上，「民間夜話」都太過簡單而直接，缺乏戲劇應有的娛樂與藝術性。然而，在政令宣導上，利用戲劇的形式以貼近人民的生活經驗，以每週一次的頻率，直接對應不同時期的主要運動（例如〈動員〉目的在宣導總動員運動），這正是當局者因應廣播媒體的特性而發展的宣傳

⁴² 寇節：〈談跳舞〉，《廣播周刊》，1:4（1952年4月19日），頁14。

⁴³ 寇節：〈母親與護士〉，《廣播周刊》，1:9（1952年5月24日），頁11。

⁴⁴ 寇節：〈敬軍〉，《廣播周刊》，1:6（1952年5月3日），頁11-13；寇節：〈青年到軍中去〉，《廣播周刊》，1:11（1952年6月7日），頁14-15。

⁴⁵ 寇節：〈動員〉，《廣播周刊》，1:12（1952年6月14日），頁7-11。

⁴⁶ 寇節：〈公共秩序〉，《廣播周刊》，1:13（1952年6月21日），頁14。

型態。

相對於「民間夜話」屬於較硬性的宣傳，「夫婦之間」則聚焦於一對夫妻的生活小事，所談內容無所不包，從婚姻、愛情、醫藥、衛生到烹飪，就像是住在隔壁的親切鄰居，收聽時毫無負擔。例如〈洗羊毛衣〉傳授洗羊毛織品的祕訣，〈簡單的西餐〉、〈經濟而營養的膳食〉指導聽眾便宜實惠的料理，〈擇偶的條件〉、〈擇偶如坐車〉、〈夫婦要互信〉、〈保持夫婦間愛情〉、〈結婚的意義〉則細述男女交往與夫妻相處應該注意的環節。除了直接討論政治的話題外，這些生活議題完全就事論事，不會順便夾帶反共或戰時意識，在當時連音樂都必需配合國策的廣播節目中，算是特別的異數。也因此，這個節目廣受歡迎，甚至在播出六年後選編劇本出版。⁴⁷

乍看之下，這種交代日常小事的廣播劇與反共知識的建構並無關係，然而這種塑造生活情境的形式，才是「夫婦之間」的意義所在。如前所述，當時的學理與實際需要，均強調宣傳必需將訊息傳達到所設定的對象，黨政當局在摸索如何對「大眾」宣傳時，使用了硬性的新聞、評論、歌曲等等，卻發現每晚十分鐘的日常情境，所得到的回響遠超過其他方式。在頻繁、簡短而貼近生活經驗的語言裡，透過劇本作家的塑造，聽眾從熟悉的聲音中逐漸「認識」了這對夫妻，共同參與生命中的大小議題。透過劇中主角榮光與萍面對各式問題的幹練與周全，彼此應對的親蜜與聰穎，培養出聽眾的「信賴感」，成為聽眾的「意義他者」(significant others)。

「意義他者」，源自 Berger 和 Luckmann 在討論社會化時，對於個體建立自我認識中的關鍵概念。他們認為，「意義他者」確認了個體的重要信念與選擇，藉由他們認識社會，遇到困難時尋求支援，最終得以建立屬於自我的形象。這種互動過程最佳的管道就是交談。⁴⁸從這個觀察來思考，聽眾當然無法直接和播音員對談，但卻彷彿參與了榮光與萍這對夫妻的長期

⁴⁷ 張道藩：〈「夫婦之間」序〉，《廣播雜誌》，87（1954年11月16日），頁4。

⁴⁸ P. L. Berger & T.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pp. 147-154.

談話，在習慣與信賴的基礎上，這對夫妻怎麼說就成了「應該」怎麼做。當遇到類似情境時，一句「人家收音機有在說……」可能就脫口而出，當生活有問題時也會致函請教，廣播節目裡的人物與情節成為重要的生活參考指南。⁴⁹一旦有需要，在「佳節重陽」中要聽眾想起「大陸上陷於水深火熱的無數同胞，大家要立下決心，早點打回去」，就一點也不勉強做作。

50

這個最不具政治宣傳形式的「夫婦之間」，展現了宣傳體系試著在戰時準備的同時，以生活絮語的方式提供軟性知識，吸引一般大眾接近廣播媒體，這無疑是對廣播特性的摸索和掌握過程。前述的「民間夜話」，之後臺北軍中電臺的「衛生講話」，中廣臺灣台「家庭時間」，警廣「警民之間」，正聲電臺「百年好合」、「先生們不要聽」，以及週日聯播節目「廣播話劇」，不論是日常知識或政治性宣傳，皆想方設法呈現生活化的面向，證明了宣傳體系在技巧上日益精進、在效果上滲入每日生活的企圖，而在當局的努力下，成功使得廣播劇成為聽眾最常收聽，以及最喜愛的節目。⁵¹以下刊物末尾所附的詳細節目表，提供每日的廣播內容，將能進一步理解日常生活的收聽環境。

（二）每日的收聽環境

除卻當時的軍中電臺以及對大陸廣播，一九五〇年代的廣播電臺呈現分區卻力圖一致的樣態。就區域而言，分為北部、中東部（臺中、花蓮）

⁴⁹ 當時吳可君就表示，像「夫婦之間」這種節目，讓聽眾「誤認節目內容就是播音員的意見」，使聽眾將播音員視為朋友，隨著他們而轉變。吳可君確實掌握到生活情境式廣播劇的感染效果，與「意義他者」的概念異曲同功。見吳可君：〈試論定型節目—以「夫婦之間」為例〉，《廣播周刊》，1:3（1952年4月12日），頁1。

⁵⁰ 張道藩：〈「夫婦之間」序〉，《廣播雜誌》，87，頁5。

⁵¹ 見行政院新聞局委託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施行，「臺灣北區廣播意見測驗」，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編印）：《民意測驗之理論與實踐》（臺北：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1964年），頁106-108。

與東南部（嘉義、臺南、高雄、臺東）；就主要電臺而言，除了對大陸廣播的自由中國之聲頻道，以及軍中各地方臺及空軍電臺外，北部有警察、正聲、民聲、民本、益世等臺，中東部有中國農民、國聲、中聲臺，東南部則有高雄鳳鳴、正言、勝利臺。這只是五〇年代中期的景況，隨著經濟的逐漸發展，政府逐漸增加與整合各地電臺，商業電臺亦有生存獲利的空間，到五〇年代底，電臺數目仍不斷變動。⁵²

《廣播雜誌》每期均有主要電臺每日節目簡表，定期有全「自由中國」地區的電臺節目詳表。所謂簡表，是省略了國歌、新聞與政令宣導，直接標明該臺製作的節目，能讓讀者一目瞭然各臺特色，而詳表則將每一時段各電臺的節目全部標出，讓聽眾能按圖索驥，準時收聽。另外，刊物中不定期地引介各電臺的節目，在介紹播音員和從業人員花絮時，也不忘將節目內容帶入，刊物確實包含了豐富的節目資訊以推廣收聽。

以此次研究時限中期的 1954 年為例，當時的每日廣播節目有分段播出、聯播時間、類型化節目與富含反共意識等特色。以北部而言，除了正聲電臺以外，大部分將一天的節目分為早、中、晚三段。⁵³早上時段（6：30-12：00）的節目除了開播的國歌、早操與新聞之外，多半偏重教育性節目，特別是英語講座；另外各電臺就其特性，分別有臺銀行情（中廣臺灣台第一廣播）、警教廣播（警廣）、福音講道（民聲與益世）、佛教之聲（民本）等節目。中午時段（12：00-17：00）除了固定時間的新聞外，音樂與戲曲節目占最大宗。晚上時段（17：00-24：00）的節目最多，內容也最豐

⁵² 一直到九〇年代，黨營、公營與軍方的電台在發射機與發射功率上仍佔絕對優勢，特別是軍方電台因負有「反制匪波」的任務，在臺灣的廣播頻道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限於篇幅無法全面納入討論，有待進一步開發研究。見王振寰：〈廣播電視媒體的控制權〉，《解構廣電媒體》（臺北：澄社，1993年），頁109-110。

⁵³ 正聲電臺從開播到結束均有節目，而民聲與民本電臺早上九點至十點休息，中午時段接連到晚上而未分隔。見〈自由中國北部各台對本省廣播綜合節目表〉，《廣播雜誌》，86（1954年11月1日），頁37。

富，教育性、娛樂音樂性、新聞、政令，以及固定晚間八點至八點半的各臺聯播節目。聯播前後為黃金時段，許多具有特色的節目集中於此時，像是中廣臺灣台第一廣播的「夫婦之間」，空軍電臺的「中華民族歷史故事特約講座」，中廣臺中、臺南台的「中南演藝聯播」，以及中國農民台的農業知識帶狀節目。中南與東南部除了廣播時間稍短、較富地方特色外（閩南語和農業節目較多），在節目安排方面大致上同於北部電臺。⁵⁴

1. 聯播節目

一天的節目當中，不論哪個時段都能輕易地接收到反共資訊。每節的新聞、輿論介紹、反共小調、新聞評論與廣播文摘，提供了政令宣達的管道。然而最特別的，莫過於晚間的聯播節目，因為在聽眾收聽的次序中，直接而強硬地斬斷所有節目的安排，硬性地從事宣傳。這項開始於 1950 年的制度，是由當時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下的廣播事業輔導會議決定，並成立聯播節目小組，由改造委員會第三、四、六組及各廣播電臺代表一人組成，第四組三室總幹事屠義方擔任召集人，中廣臺灣台負責聯播節目的編輯錄製工作。這項作法是延襲之前在大陸時期的作法，並有所更張，將聯播時間延長為一小時，節目內容每日不同，並加入戲曲雜藝，企圖緩和過於硬性的宣傳。⁵⁵（詳細節目內容請見表 2）

⁵⁴ 〈自由中國中東部廣播電對本省廣播綜合節目表〉，《廣播雜誌》，87（1954 年 11 月 16 日），頁 37；〈自由中國東南部廣播電台對本省廣播綜合節目表〉，《廣播雜誌》，88（1954 年 12 月 1 日），頁 37。

⁵⁵ 該節目表實施日期為 1950 年 10 月 10 日至 1951 年 7 月。表 2 的內容，參考自張瑞玉：〈聯播節目的創辦及沿革〉，《廣播年刊》，頁 49。

表 2：1950 年聯播節目表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20：00-20：10	國語新聞						
20：10-20：20	閩南語新聞						
20：20-20：25	特別節目	反共 歌曲	今世奇談	今世奇談	鐵幕 透視	今世奇談	一週 時事 述評
20：25-20：45		地方 雜藝			三民主義 在臺灣		
20：45-21：00		談天 下事	鐵幕透視	中國國樂		談天下事	混合 節目

戰後臺灣的第一次聯播節目，有許多元素為後來的聯播時間所繼承。新聞、時事評論、鐵幕透視與地方雜藝日後頂多改換名稱，今世奇談擴大後成為日後的「民間夜話」。「談天下事」由曾虛白擔任，「三民主義在臺灣」則宣導臺灣省政，「鐵幕透視」則以章回小說體，將「反共義士」的所見所聞以評書的方式演出。1951年10月一小時的聯播節目改為半小時，但將國語和閩南語分成兩個節目播出，並在閩南語節目中另闢一節「大陸與臺灣」，目的「俾使一般臺灣同胞瞭解大陸與臺灣的歷史淵源及地理上的密切關係」。⁵⁶1952年，因上級指示加強政治教育，增加了「我們的國父」和「我們的總統」，講述兩位的生平事蹟。

⁵⁶ 張瑞玉：〈聯播節目的創辦及沿革〉，頁51。

表 3：1953 年聯播節目表（國語部分）⁵⁷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20：00-20：10	國語新聞						
20：10-20：15	國語話劇（至九時）	反共歌曲	鐵幕傳真	歷史名人小傳	政令報導	民間藝術	民間夜話
20：15-20：30		時事分析			時事分析		

到了 1953 年，節目約略固定（參見表三）。值得注意的是，在保留之前節目內容的同時，在形式上倚重廣播劇的表達。例如，「鐵幕傳真」、「民間夜話」由對話改為小型話劇，⁵⁸星期日的聯播話劇較平時多半小時，製作費與人力投入甚大，中廣就是在此時組織話劇團，之後和作家簽約保障劇本來源。換言之，扣除每日的新聞報導，在一週聯播總時數 170 分鐘裡，廣播劇就占了 90 分鐘。即使到 1956 年，聯播節目亦再更動，但廣播劇仍舊是運用時數最多的形式（占總時數 41%）。⁵⁹

「民間夜話」的內容與廣播劇在形式上的重要性已如前所述，在一天之中最重要的宣傳時間裡大量採用廣播劇，再次證明該形式能有效滲入日常生活。其他諸如省政宣導與中國歷史人物介紹，《廣播雜誌》雖少有刊載內容，但其意在使聽者擁護政府，並油然而生民族情感，不難理解；民間藝術目的和人民打成一片，選播內容只要投聽眾所好即可。⁶⁰倒是相對於廣播劇的日常情境，「時事分析」與之後的「廣播評論」，提供了放眼國內外的世界觀，在當時資訊壟斷的情況下，這些看法透過聯播的形式，教導人民

⁵⁷ 〈自由中國北部各台對本省廣播綜合節目表〉，《廣播雜誌》，86，頁 37。

⁵⁸ 張瑞玉：〈聯播節目的創辦及沿革〉，頁 52-53。

⁵⁹ 〈自由中國各廣播電台聯合節目表〉，《廣播雜誌》，122（1946 年 5 月 5 日），頁 40。

⁶⁰ 高子銘：〈提倡民間藝術〉，《廣播雜誌》，62（1953 年 11 月 14 日），頁 21-22。

認識世界的「知識」與「判斷」。⁶¹從《廣播雜誌》目前所收錄的評論來看，配合當時的重要大事，從不同角度申論政府立場與「戳破」中共與蘇聯企圖，是最主要的工作。例如，在 1955 年年底，評論內容就當時外蒙古進入聯合國的提案，不斷闡述否決權使用的必要性，以及此舉背後所包含的蘇聯野心。⁶²

若說聯播節目表示了由上而下、統一口徑的宣傳，各電臺自行製作的節目則呈現了地域與對象設定的差異。以下所討論的類型化節目，就是在新聞與政令宣導之外的領域，雖然留存甚少資料，但卻是當時廣播節目的最大宗。

2. 類型化節目

一九五〇年代的廣播節目，除了上述廣播劇以及較為硬性的聯播節目外，軟性的娛樂與文教節目其實才是播放與收聽的主流。⁶³這些節目包羅萬象，主要可區分為音樂類、戲劇類、宗教類和教學類節目。

攤開節目表，映入眼簾最多的不是上述的政令宣導，而是音樂與戲劇性節目。教育部廣播事業管理委員會於 1954 年通過節目分類標準及各類節目應占比率，將節目區分為四類，其中以文藝所占比率最高，其餘依次為教學、服務與新聞，音樂戲劇就是包含在文藝之內。⁶⁴音樂戲劇概分為中

⁶¹ 「時事分析」的主事者為吳紹璣，「廣播評論」則除了吳氏外，還有黎東方、魏景蒙與邱楠。見〈全國聯播節目廣播評論〉，《廣播雜誌》，119（1956年3月20日），頁14。

⁶² 〈全國聯播評論縱談時事〉，《廣播雜誌》，113（1955年12月20日），頁8-9。

⁶³ 有關聽眾對各節目的喜好統計，可參見：吳道一：《中廣四十年》，頁381-386。另外，根據美國新聞處（USIS）於1961年6月委託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在臺北、基隆、臺中、高雄、臺南施行「臺灣廣播測驗」，在聽眾最感興趣和感興趣（Very interested and Interested）的節目中，戲劇與娛樂（Cinema and Entertainment）、音樂性節目均達86%，相對的政治與政令節目（Politics and Government）的支持率只有34%，顯見軟性節目為收聽的大宗。見 Office fo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SIS Taiwan, "Radio Listenership in Taiwan, A Survey Report," 《民意測驗之理論與實踐》，頁59。

⁶⁴ 溫世光：《中國廣播電視發展史》，頁282。

國與西洋兩種，依分類節目表的區分，中國部分有國樂、地方雜曲（粵曲、潮樂、閩曲、申曲）、平劇、地方雜劇（粵劇、越劇、歌仔戲、相聲、大鼓、方言話劇、彈詞、滬劇）、中國歌謠（反共歌曲、反共小調、時代歌曲、臺灣歌謠）；西洋部分有西洋音樂（管弦樂、室內樂、輕音樂、古典音樂、小提琴曲、爵士）、西洋歌曲（歌舞名曲、西洋歌曲、電影歌曲、西洋名歌、歌劇、聖樂）。另外，歌謠教唱與廣播話劇亦包含在內。⁶⁵

「國樂」一詞本身就是近代民族國家建立過程的產物之一，透過特定的樂器、演奏型態與選定的歌曲，展現出屬於該國獨有的文化。《廣播雜誌》在介紹各電臺中國音樂節目時，該文的開場白是這樣的：⁶⁶

你愛聽中國音樂嗎？這似乎不像一個問題，因為中國人必然愛聽中國音樂的，就像我們不習慣每天吃西餐一樣，所以一個人愛聽自己祖國的音樂原是很自然的。

這段話反過來說，不聽祖國的音樂是不自然的。若以臺灣為主體，戰前與戰後的「祖國」、音樂、文化截然不同，去日本化與祖國化的工作持續進行。廣播電臺參與此一工程，除了節目播放外，國樂團的成立亦有賴電臺支持。此外，中國戲曲方面儘量涵蓋中國各地域的需求，使得各地鄉親還能聽到屬於自己的方言藝術。⁶⁷整體而言，在娛樂性的音樂戲曲中，仍政治性地保有中國的格局，維繫著來到臺灣各省聽眾的情感。至於反共歌曲中明示「萬惡共匪」、「反攻必勝」、「擁護領袖」等意涵，旁及吉他教學曲譜也需納入愛國歌曲，意圖直接，不必再多作解釋。

當然，仍有些節目與政治性考量較無直接關連，例如西洋音樂的部分，而宗教類節目和教學類節目也是如此。宗教節目主要有佛教（民本、國聲電台）與基督教，伊斯蘭教在五〇年代初期亦有節目。這些節目時段並不

⁶⁵ 〈分類節目表〉，《廣播雜誌》，109（1955年10月20日），頁36-38。

⁶⁶ 起風：〈各台的中國音樂節目〉，《廣播雜誌》，61（1953年10月31日），頁15。

⁶⁷ 希眠：〈地方戲曲和民間藝術〉，《廣播雜誌》，62（1953年11月14日），頁12。

多，卻體現了臺灣宗教團體運用較新式媒體的傳道方式，例如路德教會為吸引信眾，只要去函電臺，就能獲得免費的小型金色十字架。⁶⁸教學性節目在全部播出時間中所占比例甚高，僅略低於音樂戲劇，從開播到收播皆有各類講座與教學，其中以英文教學最多，《廣播雜誌》長期刊載英文教材與空中教學講義，而文化、歷史、平劇與國語講座等節目亦有一定份量。⁶⁹

此外，對大陸廣播是另一類型的節目設計，新聞與宣傳節目占大部分時段，音樂等娛樂性節目不多，這是因應中國大陸聽眾難以長時間收聽而作如此更動。但是，在節目安排上仍有剛性、柔性的區別，在柔性節目中注入「有人情味的軟語叮嚀」，以對抗中共嚴肅訓話的廣播。⁷⁰

1953年，總統蔣中正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其中指出廣播節目應將宣傳和教育並重，且應結合文學與音樂等藝術形式，因為中共就是藉由文學戲劇將階級鬥爭的思想灌輸到國民心理。⁷¹此篇以蔣中正名義發表、實則代表當時黨政高層對於文藝走向與休閒娛樂的政策性文件，明白表示了政府介入日常生活的企圖。證諸類型化節目的內容，在肩負認同塑造和反共國策任務的同時，生活化、實用化與娛樂化的節目深受重視，

⁶⁸ 柳放：〈各台宗教節目綜合介紹〉，《廣播雜誌》，60（1953年10月17日），頁24-25。

⁶⁹ 〈分類節目表（講座及教學類）〉，《廣播雜誌》，111（1955年11月20日），頁37-38；〈各電臺教學類節目一覽表〉，《廣播雜誌》，125（1956年6月20日），頁38-39。

⁷⁰ 楊仲揆：〈論心戰廣播〉，《廣播實務》，頁110。對大陸廣播的節目型態獨樹一格，且由於臺灣亦能收聽，在反共知識的建構管道上亦屬重要，可惜《廣播雜誌》中相關內容不多，有待繼續挖掘研究。相關研究可見：劉侃如：〈當前匪我廣播戰之比較研究〉，《廣播與電視》，2（1973年9月），頁15-19；楊仲揆：〈我們怎樣展開對大陸心戰廣播（一）〉，《今日中國》，140（1982年12月），頁37-91；楊仲揆：〈我們怎樣展開對大陸心戰廣播（二）〉，《今日中國》，141（1983年2月），頁63-79；楊仲揆：〈我們怎樣展開對大陸心戰廣播（三）〉，《今日中國》，142（1983年3月），頁21-42；楊仲揆：〈我們怎樣展開對大陸心戰廣播（四）〉，《今日中國》，143（1983年4月），頁49-74。

⁷¹ 王鈞：〈偉大的號召，光榮的事業：恭讀「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對廣播之指示〉，《廣播雜誌》，65，頁1；張源齊：〈從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析論我國廣播事業應有之發展〉，《藝術學報》，35（1984年6月），頁151-173。

並以此作為吸引聽眾的重要手段；而廣播劇對於建構生活情境的努力，隱藏於輕鬆自然外觀下的，其實代表的是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宣傳與控制方面的摸索與實踐。

四、小 結：邁向精密控制的一九六〇年代

本文希望能從政治生活化的角度，重新建構五〇年代臺灣庶民的日常生活，使社會文化史的範疇能進一步與政治宣傳體系的研究相互配合，突破以往相關討論各自為政的限制。過去對於國民黨在臺鞏固政權的過程，多從外部的制度、上層的政經措施與重要人事變遷切入，缺乏執行狀況的描述與分析；而有關社會文化史的探討，又多集中於特定領域（如民間歌謠、文學與大眾娛樂），雖不時提到黨政體系的介入，但多將黨政意志視為外部性質、無所不在或無所不能的強勢力量，對於當局如何究竟如何將政策落實到基層的手法，其力量與限制為何，則多語焉不詳。

本文為了突破此一侷限，首先從準戰時體制的概念出發，粗略檢視日治時期總動員體制與中華民國抗戰、動員戡亂體制下的廣播媒體環境。在戰後刻意維持下，這些戰爭時期的媒體控制方式被部分地保留下來：日治時期初具規模的收音機市場與收聽習慣，成為戰後發展廣播的重要基礎；動員戡亂與戒嚴時期的法律，構成一九五〇年代廣播媒體的管制架構。在政府有意的鼓勵下，五〇年代收音機數量迅速增加，到了 1960 年已然成為文字之外重要的日常生活媒體。同時，檢證當時的傳播理論，只將資訊傳達出去，就能對接收者造成影響的「子彈理論」仍占主流，臺灣的主要支持者美國亦透過廣播向共產國家發聲，在兵不血刃卻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考下，廣播媒體的煽動性、即時性和遠距離穿透等特點被臺灣黨政宣傳體系所重視。對外既可以電波「攻擊」，對內則鼓吹反共意識，廣播成為在沒有立即軍事行動的情況下，維持戰時作為的重要表現方式之一。

其次，本文由最基礎的文本分析出發，從貼近日常生活的媒體傳播內容，重建五〇年代民眾的閱聽世界，考察建立他者（共產集團、禍國殃民的中共）與塑造認同（反共必勝、領袖崇拜、中華文化）的重要管道；同時由具體的節目內容中，探索構築資訊傳播的形式與技巧。簡而言之，從日常生活所接觸的簡單訊息，挖掘出黨政體系控制社會的摸索過程。透過《三民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理解到當時的黨政高層，已然注意到實用性（教學）與政治性並重、藝術娛樂與宣傳結合的道理。空中教學的開辦、教學性節目比例的上升、廣播劇形式的運用與投入大量資源，皆體現了此種思考的路徑。對生活情境的營造，以及軟性娛樂功效的認識，皆可視為是在痛失大陸、敗於中共「宣傳技倆」下，所發展出來的新技巧。或許有人認為，早在大陸時期國民黨即已推行「新生活運動」，企圖涉入人民生活細節，不能視之為新，但五〇年代廣播劇由簡陋到成熟，顯示中華民國政府已逐漸擺脫 1949 年「風雨飄搖」的危機，開始向民眾傳達更為柔軟的形象，成為人民的「意義他者」。在黨政部門篩選和壟斷資訊的環境中，建構出一個鼓吹戰備卻又容易親近的廣播世界，這就是五〇年代臺灣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建構反共知識的重要管道。

準戰時體制的概念，既提供觀察戰爭遺留與維持戰時的面向，也暗示了與真正戰時的差距，廣播媒體對貼近人民生活軟性形象的重視，也具有戰時弱化的可能性。吳乃德在分析救國團時，認為五〇年代成立初期所設定的組織學生功能，到了六〇年代轉向以休閒娛樂和社會服務創造支持力量⁷²。從廣播節目的內容來看，早在五〇年代中期，生活化與娛樂化的傾向已然受到重視，宣傳媒介逐漸轉變為民眾的資訊來源和生活輔導者，可見得渡過四〇年代末的動盪，五〇年代初的摸索，到了六〇年代新的統治手法獲得確立，亦即政府有能力以更細膩的手法，吸引人民接受宣傳與統

⁷² Nai-teh Wu (吳乃德),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p.145-155.

治，在不忘戰備宣傳下，強化政府的軟性形象。⁷³

簡言之，投入越多資源塑造可親的生活情境，意味著黨政部門的介入更為細緻深層。相對於表現形式的柔軟化，法令體制上的管制卻越趨嚴格，1959年所實施的「廣播無線電臺設置及管理規則」與「廣播無線電臺節目規範」，不但嚴格控管廣播從業人員，要求撰寫節目與工作日記，並針對不同類型的節目，制訂言論規範與語言使用。⁷⁴可以說，國民黨政府經過五〇年代的摸索，逐步建立起有效的宣傳方式，以親切的外表和嚴格的管理，跨進精密控制的一九六〇年代。

⁷³ 《廣播雜誌》僅為一份當時接受補助的廣播附屬刊物，限於經費與定位，無法呈現整體廣播內容的全貌。但若和法規、電台本身的史料相較，《廣播雜誌》所呈現的部分節目內容，則可提供另一種觀察角度，亦即生活化情境的嘗試。與廣播所擔負的維持戰時作為相對照，這種看似矛盾的景況，一則是史料本身的性質與觀察角度所致，二則是準戰時體制下戰爭逐漸弱化的趨勢。

⁷⁴ 薛化元、楊秀菁：〈戰後臺灣新聞自由的歷史考察（1945-1988）〉，頁27-28。

徵引書目

(一) 檔案與專書

- 「全省軍公民營廣播電台安全調查檢討報告」，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廣播安全會報，1966年3月，國史館藏，030.07/3780.01-01。
- Jowett, Garth S., Victoria O' Donnel (著)：《宣傳與說服》。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Berger, P. L. & T.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Y: Doubleday & Copany, INC., 1966年。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編印)：《宣傳工作手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1969年。
-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編)：《中廣五十年》。臺北：空中雜誌社，1978年。
- 中國廣播事業協會(編)：《廣播年刊》。臺北：中國廣播事業協會，1955年。
- 中華民國七十年新聞年鑑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新聞年鑑》，民國七十年。臺北：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1981年。
- 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編印)：《民意測驗之理論與實踐》。臺北：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1964年。
- 中華民國新聞年鑑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新聞年鑑》，民國五十年。臺北：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1961年。
- 中華民國廣播電視事業協會(編印)：《廣播實務》。臺北：中華民國廣播電視事業協會，1982年。
- 日本放送協會(編)：《20世紀放送史》，上。東京：日本放送協會，2001年。

- 有山輝雄、竹山昭子（編）：《メディア史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2004年。
- 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中華民國六十五年統計提要》。臺北：行政院主計處，1977年。
- 何義麟：《跨越國境線—近代臺灣去殖民化之歷程》。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年。
- 佐藤卓巳：《現代メディア史》。東京：岩波書局，1998年。
- 吳道一：《中廣四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68年。
- 呂紹理：《水螺響起》。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年。
- 翁秀琪：《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
- 崔小萍：《天鵝悲歌：資深廣播人崔小萍的天堂與煉獄》。臺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 貴志俊彦、川島真、孫安石（編）：《戦争・ラジオ・記憶》。東京：勉誠出版，2006年。
- 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編註）：《新聞自由（1945-1960）》，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臺北：國史館，2002年。
- 溫世光：《中國廣播電視發展史》。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卷五一教育志文化事業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8年。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卷五一教育志·文化事業篇第二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年。
- 鄭瑞城、王振寰（等著）：《解構廣電媒體》。臺北：澄社，1993年。

（二）期刊與學位論文

- 《廣播周刊》，1:1（1952.03.30）-4:13（1953.03.28）；《廣播雜誌》，5:1（1953.07.25）-10:12（125，1956.06.20）、111-130（1955-1956）、234-268

(1964-1967)。

Wu, Nai-teh. (吳乃德),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 D Thesis, Dp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

日本放送協會(編):〈台湾の放送事業〉,《ラジオ年鑑》,昭和十七年(東京:日本放送協會,1942年),頁343-350。

日本放送協會(編):〈台湾の放送事業〉,《ラジオ年鑑》,昭和十八年(東京:日本放送協會,1943年),頁263-271。

何光國:《廣播節目製作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60年。

何家駒:《我國電視興起對廣播影響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71年。(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2002.5),頁297-333。

林果顯:〈戰後臺灣統治體制的再思考—威權體制的理論與適用〉,《現代學術研究》,專刊13(2004年12月),頁45-82。

張長智:《美國國際宣傳》,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68年。(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源齊:〈從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析論我國廣播事業應有之發展〉,《藝術學報》,第35期(1984.6),頁151-173。

陳世慶:〈中廣事業在臺之發展〉,《臺灣文獻》,21:4(1970.12),頁72-103。

陳世慶:〈民營廣播建設在臺灣〉,《臺灣文獻》,22:2(1971.06),頁89-103。

陳世慶:〈軍公廣播電臺在臺之發展〉,《臺灣文獻》,22:1(1971.03),頁155-181。

程宗明:〈臺灣戰後廣播工作的控制與依附研究(1947-1961):抑制需求面與管制生產面的收音機產業〉,《傳播論文選集1997》(臺北:中華傳

播學會，1997年），頁319-370。

楊仲揆：〈我們怎樣展開對大陸心戰廣播（一）〉，《今日中國》，140（1982.12），頁37-91。

楊仲揆：〈我們怎樣展開對大陸心戰廣播（二）〉，《今日中國》，141（1983.2），頁63-79。

楊仲揆：〈我們怎樣展開對大陸心戰廣播（三）〉，《今日中國》，142（1983.3），頁21-42。

楊仲揆：〈我們怎樣展開對大陸心戰廣播（四）〉，《今日中國》，143（1983.4），頁49-74。

楊肅民：《限證政策下我國報業問題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84年。（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管中祥：〈「國民黨國機器」操控媒介資訊形式的轉變（1924-1999）〉，《傳播文化》，9（2002年春季），頁163-201。

劉侃如：〈當前匪我廣播戰之比較研究〉，《廣播與電視》，2（1973年9月），頁15-19。

薛化元、楊秀菁：〈戰後臺灣新聞自由的歷史考察（1945-1988）〉，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1-2411-H-004-027，2003年。

